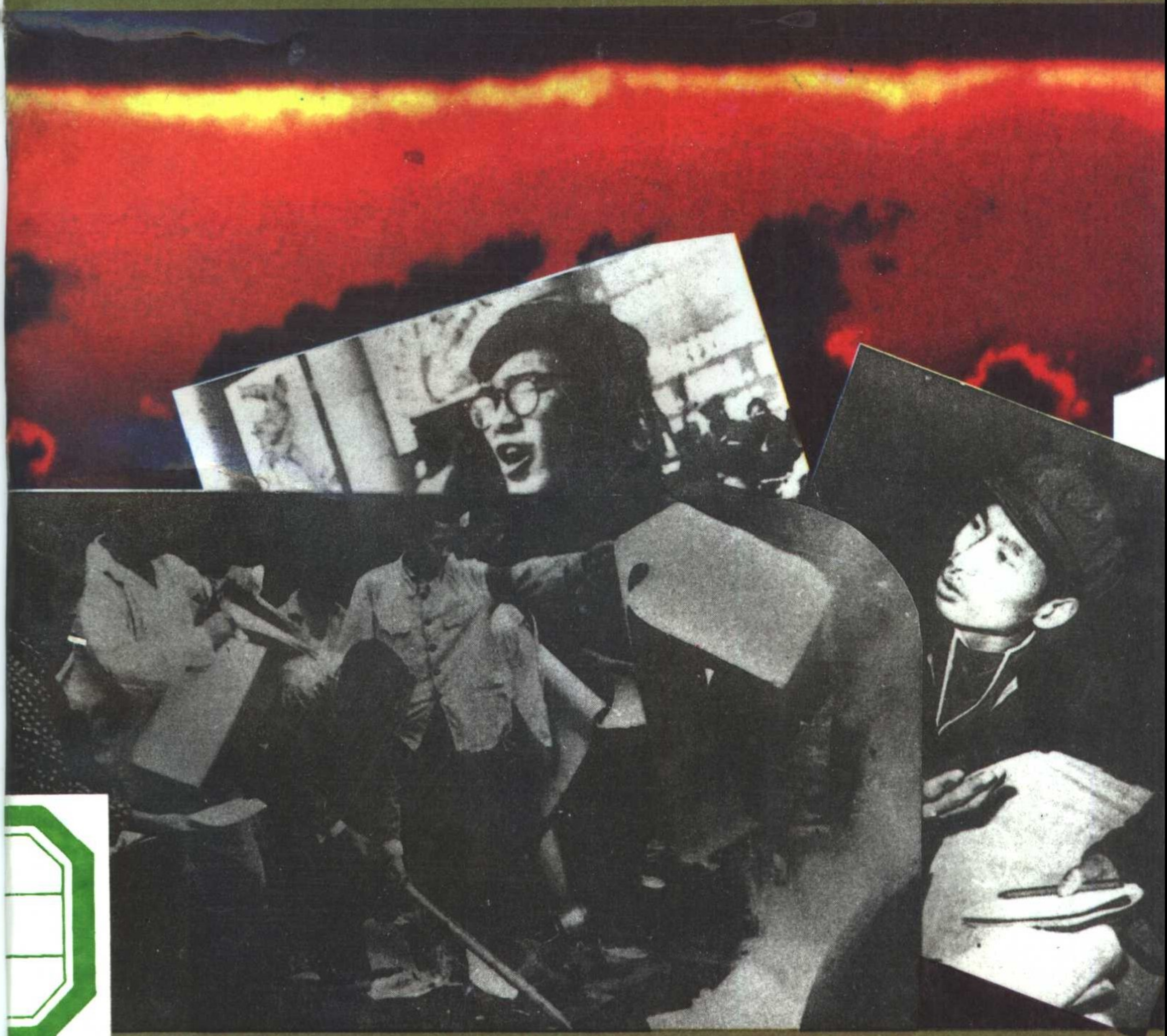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文革闯将” 封神榜



团结出版社

·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

“文革”闯将封神榜

阳 木 编著

团结出版社

新登记号(京)174号

责任编辑：张小琳

版式设计：毕燕

“文革”闹将封神榜

阳木 编著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城根南街64号)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32 开 印张 12.5 字数 320 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1-719-X/1·129

定价：9.80元

目 录

风云人物特写

王力——一个“文革”理论家的沉沦…………… (1)

- 王力深如其意，要给康生开脱
- 毛泽东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
- “活着干，死了算！”这杀气腾腾的口号竟是这个理论家的大手笔
- 脚绑石膏细带的王力成了世界注目的中心人物

关锋在“文革”中…………… (18)

- 大家举杯，祝1967年在全国开展全面内战
- 怎么全国5个夺权样板省中有4个领导人是山东籍人？
- 关锋的手很早就伸到了军队内
- 关锋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也落入了“特务”的“系统”

《人民日报》的“白字”总编——鲁瑛…………… (24)

- 江青集团基本以山东人为骨干

- 晋瑛经常把一些文理不通的稿子送到周总来那里
- 晋瑛虽不能为张基桥、姚文元文章增辉，却知道效奔走之劳
- 晋瑛接到了她有生以来最为奇特的一封信

乱世狂女聂元梓 (36)

- 聂元梓有一份十全十美令人起敬的履历
- 聂元梓对周总理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 江青的座车开进65号小楼，密召聂元梓，交了底
- 北大二百多名干部、教授、讲师被批斗、游斗、强迫劳动、烟头烫、铁棍打、钢丝鞭抽……不堪忍受自杀身亡的有21人
- 江青突然发怒，对聂元梓呵斥：“你们去上海串连，怎么打我的名义？！”
- 为争四清反派第一领袖的地位，聂元梓决定要抢三个“头功”。
- 她的个人生活很不幸

昔日造反派“司令”，今朝总工号“大富”

——蒯大富的路 (67)

- 蒯大富感到，好机会又来了，一定要在“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流中抢个头功
- 蒯大富鼓吹要打倒中央的“第三个司令部”

- “天”派地“派”之争，成为北京高校武斗的导火索
- 蒯大富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 蒯大富给迟群写信说：说不定将来我这个阶下囚会成为你的座上客呢！
- 蒯大富后期的张狂不羁，一意孤行使毛泽东受到极大刺激

韩爱晶的龙袍梦 (78)

- 他梦见自己睡在龙床上，头戴龙冠，身披龙袍
- 以古为镜知兴替，他贪婪地吸吮着前人玩弄权术的“精神遗产”
- 终于得到那张叫他垂涎三尺的“党票”
- 他对毛泽东说：“派一个解放军来监视我好啦”

谭厚兰的生与死 (85)

- 谭厚兰以她特有的敏感发现，中央有着不同的声音
- 谭厚兰率领200余人到曲阜搞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无恶不作
- 她作为中国红卫兵代表团成员，访问阿尔巴尼亚，在五大领袖中独领风骚
- 她常常喃喃地重复着这样的话：“我希望宽恕我这一次……”

出狱后的张铁生 (90)

- 再过几小时，他就要走出这15年来寸步未离的小屋
- 他万万没有想到监狱之外会有一个女人在痴情地等待他
- 他灵机一动，何不换个角色碰碰运气，也许能扭转人生的轨迹
- “他不仅要学兽医，还要当一个人医……”

于会泳：一个音乐家的毁灭 (99)

- 一触及“叛徒”这两个字眼，一股寒气不禁从脚底直冲脑门
- 于会泳有一个绰号——“党内民主人士”
- 在公众场合江青对于会泳所表现出来的亲昵，自然使于会泳更为得意
- 面对毛泽东的批示，江青和张基桥暗示要于会泳做“摘黄牌”
- 于会泳将150毫升左右的“来沙尔”仰头灌入自己口中
- “文革宠儿”——浩亮复出记 (116)
- 江青要拉一批自己的人，她把眼光转向程浩亮，对他施展手腕
- 钱浩梁有了一个“钦赐”的大名：浩亮
- 给朋友的印象是：浩梁心情灰黯，情绪消沉，采取一种闭关自守、听天由命的态度

- 钱浩亮的出演，颇得人心

庄则栋沉浮记…………… (138)

- 他踉踉地站到椅子上，腿在颤抖，双手抓住九龙绳……
- 一种比奖杯和金牌更耀眼的东西在诱惑他
- 他还没有机会向江青表过忠诚，这倒是个机会
- 刚才，一个电话，在他面前揭示了政治舞台上最严密的一道帷幕
- 床头的红机子又响起来，他既盼望又害怕听到红机子的铃声
- 他恶骂怒吼道：“你跟江青走你的阳关道……”

四任“外交部长”姚登山夺权始末…………… (243)

- 他不胜唏嘘地说：“我竟然成了一块最耀眼的脖子”
- 林杰说：“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痛心地下眼泪，后悔过于轻信“革命小将”的保证
- 监狱竟是他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姚述蔚——一个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工人…………… (254)

- 他恰好撞了个冷门，很快就被誉为西安一大造反派的头头
- 他亲临虎斗一役，指挥“工联”冲锋陷阵

- 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军国大事，真是不堪重负
- 他是个拿68.86元工资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判决书选登

戚本禹判决书.....	(261)
迟群判决书.....	(264)
刘庆棠判决书.....	(269)
齐景和判决书.....	(273)
赵登程判决书.....	(277)
舒龙山判决书.....	(281)
刘结振·张西挺判决书.....	(285)
张铁生判决书.....	(290)
唐岐山判决书.....	(294)
唐忠富判决书.....	(297)
胡勇判决书.....	(301)
叶卫东判决书.....	(305)
张犀判决书.....	(308)
翁秉楠判决书.....	(312)
张永生判决书.....	(316)

黄兆其判决书	(318)
刘殿农判决书	(324)
涂晓雷判决书	(329)
胡延观判决书	(334)
刘光兴判决书	(338)
何立宽判决书	(343)
华林森判决书	(348)
曹邦元判决书	(352)
孙昌德判决书	(355)
徐英年判决书	(359)
牛成山、聂士荣判决书	(362)
韩潮判决书	(368)
邵岩斌判决书	(371)
审判涂烈、万里流纪实	(374)
王夏印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382)

王力—— 一个“文革”理论家的沉沦

司 任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都可以如数家珍地数出一串被打倒对象的“百家姓”来：王、关、戚、林、陈、黄、吴、叶、李、邱、王、张、江、姚……其中王姓有两个，后一个是臭名昭著的王洪文，而前一个——王力，30岁以下的人就不太知道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个王力教授，汉语音韵学专家，学术驰名中外，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另一个——当年中央文革的一员闯将和理论家。

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是江苏淮安县人，1923年生。17岁时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改名王力。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是康生，同在渤海区委工作的还有关锋、刘格平、鲁瑛、王敏昌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力到上海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1953年，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宣传组负责人。回国后，升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他参与了许多党政、军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其中有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论战

的九封信，林彪著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因为他曾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10次去苏联莫斯科谈判，陈伯达曾改郭沫若送康生的一幅对联“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为“十下莫斯科”，书赠王力。钓鱼台，是指当时写作班子驻地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那篇“文化大革命”导火索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王力也不知道内情，他的时运，是随着批判《二月提纲》而起的。

1966年2月3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康生等人参加，王力也列席其中。会后，彭真指示许力群、姚锦整理成《二月提纲》，指出学术批判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针对姚文元等人的学阀作风有感而发的，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了全党。3月，毛泽东在杭州同江青、康生三次谈话中，表示了对《二月提纲》的极为不满。他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还不明白毛泽东要借此做大事的意图，他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泽东看了后不满意地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在1966年4月初写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初稿，也就是后来人们惯称的“5·16通知”。毛泽东对初稿作了重要修改，加进了几段重要的内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蹲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提纲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同时，康生又说：“光有通知不够，还要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下发。”康生还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吴冷西开脱一下。”起草大事记的王力深知其意，首先是要给康生开脱。他明明知道《二月提纲》发出时，康生是看过的，却在大事记里写道：《二月提纲》制造时，“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漏一点消息”。

为了修改这两个文件，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王力、张春桥等人。这个小组便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5月初，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王力虽热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但因起草文件有功，也列席了会议。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王力成为组员之一。据说，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认为他不合适，但在陈伯达的力保之下，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真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全国教育战线顿时大乱，纷纷质问校党委，揪斗“黑帮”，处于失控状态。同时发表的王力、关锋、曹秋歌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煽动要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说：“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么高的职位，多老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恶毒、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称赞说：“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并且在评论员文章中加进了一段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以后《红旗》杂志发表此文时，就

多出了这一段文字。

其后，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骨干力量，成了“中央首长”。当时中央文革有所谓“大三”、“小三”之称。“大三”指江青、康生、陈伯达；“小三”是指除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之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一期间，王力除频繁地接见群众代表、发布讲话指示外，更多地是承担了《人民日报》社论文章的起草。7月，他还协助陈伯达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0月，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其号令，便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第18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号召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个狂潮中，工厂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停工停产、揪斗干部的事件此起彼伏。

11月初，王力又协助陈伯达起草了旨在取消中共中央多次发出的工交企业、农村搞正面教育规定的一个文件《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7日，他和陈伯达召集了职工代表会。王力讲话说：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因素，对文化大革命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而一个星期前，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刚刚爆发了一场卧轨拦车事件，沪宁全线停驶30多个小时。王力的讲话，无疑使王洪文等人的行为得到合法化，效法的人们纷纷离开了车间。

作为中央文革的笔杆子，王力写了大量“理论”和实际文件，也有不少创造。1967年5月，为纪念5·16通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红旗》联合发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创立；列宁、斯大林的发展；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毛泽东的发展被称之为“第三个里程碑”，这是王力独出心裁的发明，其后

被广泛使用。林彪、张春桥等人还为争夺“第四个里程碑”的旗帜进行了争斗。

最让王力得瑟的，是他代毛泽东在1966年10月起草的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电文中引用了两句唐人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并把阿尔巴尼亚尊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这篇脍炙人口的“最高指示”王力至今不忘，但毛泽东并不看重。1973年7月，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因中美关系缓和指责中国右倾时，毛泽东曾嘲讽地说：“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明灯’（文章）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

当时，王力不仅摇笔杆，而且冲锋陷阵，唇枪舌战。1966年11月，在全国工交企业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及许多部长、省市领导人刘澜波、吕正操、吕东等人对中央文革利用“文化大革命”把经济搞乱十分气愤，发旨斥责陈伯达、王力。12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召开，严厉批判“抓生产”的各位部长。王力一马当先对中央主持宣传工作的陶铸等人发动突然袭击，他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压下去了。这是第三次起来。（陶铸）又发了社论《抓革命，促生产》，陶铸“就是主张要压”。他还接着陶铸质问：社论中对“文化大革命”“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要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工厂能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一个中央文革组员，为什么敢对中央排第四位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如此顶撞？因为，王力知道，他背后有林彪、江青。所以，尽管陶铸被迫作了检查，还是在一个月后被打倒了。王力，则当上了接管陶铸执掌宣传大权的中央宣传组组长，实际上的中央宣传部部长。

更大的风波，也就是王力更加发挥作用的机会，还在反击

“二月逆流”之时。2月16日，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余秋里等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向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猛烈开火。谭震林愤慨地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余秋里发言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王力把当时认为不对的话，包括余秋里拍桌子都一一记录在案。他们知道，这是调动毛泽东不满的的极好材料。

会后，张、王、姚三人凑在一起，把材料整理出来，由王力执笔写成要点，然后三人直奔江青那里。江青暴跳如雷，立即给毛泽东打了电话。晚10点，江青带着他们见了毛泽东。然后，又向林彪作了汇报。由于他们的迅速行动，使周恩来失去向毛泽东解释的机会。果然，毛泽东震怒了，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六次“生活会”，对老帅们进行严厉批判，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从此，中央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文革成员们个个拍手相庆，汇报有功的王力涛兴大发，写了一首庆贺胜利的诗：

大天抖来气，
臭当如顺风，
长腰推在手，
当家做主人。
活着干，死了算，
搞好了当谢大富，
搞不好进公安局。

这些诗句马上传到社会，成为中央文革铁拳头——三司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然而，谁又曾想到，这些杀气腾腾的口

号竟出自一个“理论家”王力的手笔。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王力，他忠实地记下了老师们的言行，使他们铁骨铮铮的风貌永垂青史。今天，人们传诵的“大闹怀仁堂”的材料，盖出于此。

此后，全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各地抢夺枪支，流血武斗，拦截列车，冲击部队……一浪高过一浪。连身经百战的林彪也苦笑着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为了控制局面，6月，毛泽东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云南、贵州、四川解决西南武斗严重的问题。成员有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李再含。虽然谢富治排名在王力之前，但王力是中央文革的代表，因此，他在其中份量最重。

7月14日，王力、谢富治在重庆促成两派群众组织签订了一个协议后，立即飞往武汉。当日晚，毛泽东也乘车到达。毛泽东试图亲自解决武汉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王力、谢富治没有去车站迎接毛泽东，而是上街看大字报去了。很快，他们被群众认出，大街上出现了两派欢迎王力、谢富治的大标语。

毛泽东听取了王力、谢富治的汇报后，确定了支持武汉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的方针，认为武汉军区在反左中支持“百万雄师”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又指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一心想抢头功的王力和谢富治来到武汉水利学院。他们在讲话中透露了毛泽东的意图。王力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表明了支持“三钢”造反派的态度。他们的讲话立刻激怒了人数众多的“百万雄师”，认为这是拉一派打一派。当日下午，王力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上又教训在座的师以上干部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他在讲话中又把“百万雄师”说成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把“钢工总”造反派说成是“高举旗帜的革命派”。一直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干部听了这番话不禁怒火中烧。